军事政治

论大凌河之战

阎崇年

[**摘要**] 大凌河之战，后金将围城、和谈、攻坚、打援相结合，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围城打援、亦战亦款的成功战例。本文叙述战役过程并分析双方得失，阐明此役的影响：后金变革军制，开始组建八旗汉军，调整对明兵略，深入中原，掳掠财富。大凌河之战，后金获得战略性的胜利，明朝遭到战略性的失败——加速了明亡清兴的历史进程。

[**关键词**] 大凌河城　大凌河之战　皇太极　祖大寿　明亡清兴

[**中图分类号**] K248.305　[**文献标识码**] A　[**文章编号**] 1002 - 8587 (2003) 01 - 0048 - 11

The Battle of Dalinghe City

In the battle of Dalinghe city, the Later Jin won a strategic vicrtory, while the Ming dynasty suffered a strategic failure. Combining seige tactics, negotiation, attack, and cutting off Ming reinforcements, the Later Jin attained victory. As a result of this battle the Later Jin forced the Ming general Zhu Dashou to surrender and destroyed the city of Dalinghe. The important direct influences of this battle were: (1) the Later Jin reorganized its military system and established the eight Han banners; (2) the Later Jin adjusted its strategy, troops penetrating into the Chinese interior via Mongolia; (3) it accelerate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Ming dynasty.

天聪五年即崇祯四年 (1631) 七月二十七日，到十一月初九日，后金与明朝在辽西进行的大凌河之战[①]，后金获得战略性的胜利，明朝遭到战略性的失败。此战的导因、过程、特点及其影响，兹作阐述，略加讨论。

一

在大凌河之战以前，后金与明朝都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变局。后金天命汗死，皇太极继位；明朝天启帝死，朱由检继位。两位登极新君，都在庙堂上，施展新政；也都在战场上，力图进取。后金与明朝，各随着政局的突变，而影响其军事局势的变化。因此，大凌河之战的爆发，既有其历史延续之必然性，也有其变局引发之偶然性。

在后金方面。天命十一年即天启六年 (1626) 正月，后金军进攻宁远，遭到惨重失败。同年八月，天命汗努尔哈赤死去。皇太极继承汗位，改元天聪。天聪元年即天启七年 (1627) 正月，皇太极派二贝勒阿敏等率军东攻朝鲜。后金军过鸭绿江，破义州、陷平壤。同朝鲜先订“江华之盟”，后订“平壤之盟”。后金同朝鲜结为“兄弟之盟”。朝鲜由明朝的盟友，而变为后金的“兄弟”。同年五月，皇太极为洗雪先父宁远兵败之辱，并藉军事胜利

[**收稿日期**] 2002 - 9 - 18
[**作者简介**] 阎崇年 (1935 —)，男，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；北京 100101

巩固新汗权位，兼乘官兵朝鲜获胜之锐气，发动宁锦之战。后金军先攻锦州，祖大寿坚守，不克；继攻宁远，袁崇焕固守，又不克。明军采取“凭坚城以用大炮”[2]的战术，获得“宁锦大捷”。皇太极愤然道：“昔皇考太祖攻宁远，不克；今我攻锦州，又未克。似此野战之兵，尚不能胜，其何以张我国威耶！”[3]

努尔哈赤、皇太极先遭宁远之败，继遭宁锦之败，对明关锦防线，产生畏惧情绪。后金遇到明朝铁将袁崇焕和祖大寿，明军铁城宁远和锦州，攻之不克，战之不胜。由是，皇太极改变直接攻明辽西关锦防线的战略，而大胆采取避开宁、锦，迂道蒙古，破墙入塞，直捣明都的兵略。天聪三年即崇祯二年（1629）十月，皇太极亲率大军，从大安口和龙井关突破长城，陷遵化，略通州，攻北京。袁崇焕率军驰援，“士不传餐，马不再秣”，在北京广渠门、左安门战败后金军的进攻。但皇太极采用范文程奏献的“反间计”[4]，陷害袁崇焕。崇祯帝中其计，将袁崇焕下诏狱。翌年，后金军从北京回师，占领永平等四城。明督师孙承宗统军向永平等四城发起反攻。后金大贝勒阿敏等不敌，弃守永平。明军收复永平、滦州、迁安、遵化四城。皇太极虽借机将其政敌阿敏严惩，却从此不再统兵进入中原。时后金已制成红衣大炮。后金贝勒诸臣力劝皇太极，趁大凌城垣尚未完工之时，派军前往，摧毁其城，以免其成为宁远、锦州之东的又一座坚城。

后金军进攻锦州受挫，转攻关内又受挫，再调整策略——伺机进攻明朝辽西关锦防线的前锋堡垒大凌河城。

明朝方面。崇祯帝登极后，惩治阉党，赐魏忠贤死，启用东林党人，朝政为之一新。但“己巳之变”，京师被围，庙社震惊。崇祯帝将兵部尚书王洽下狱论死，又将蓟辽督师袁崇焕凌迟处死。天聪五年即崇祯四年（1631），督师孙承宗指挥军队，收复永平等四城。崇祯帝仍希望以新的辽东胜利，振奋朝野，鼓舞军心。孙承宗冀图整顿辽西防务，加固关锦防线，筑驻右屯，渐图失疆。孙承宗驻镇山海关，重新整顿关锦防线。在这段时期，修筑大凌河城。时明辽军与后金军在辽西攻守的堡垒是大凌河城。大凌河城为明辽西关锦防线的前锋要塞，先后三次，遭到毁弃。

先是，宣德三年（1428），建大凌河中左千户所城。[5]城南距锦州四十里，以近大凌河而名。大凌河“城周围三里三十步，阔一丈。嘉靖癸亥（1563）巡抚王之诰包筑，高二丈五尺，门一，四角更房一。”[6]明朝自有辽事[7]之后，关锦防线北段，重点为宁远、右屯、锦州、大凌河四城。天命七年即天启二年（1622）正月，后金夺占辽西广宁城。经略熊廷弼、巡抚王化贞，带领军民撤退到山海关内。后金军进至中左所。是为大凌河城第一次遭到弃毁。

继是，孙承宗替代王在晋任辽东经略。时“自王化贞弃广宁后，关外八城尽空。”[8]孙承宗与袁崇焕议，重点建立宁远、右屯、锦州、大凌四城，缮城驻守，进图恢复。天命十年即天启五年（1625）夏，阉党藉柳河兵败，劾及孙承宗，奏劾章疏，凡数十上。孙承宗被迫去职，以高第代为辽东经略。高第命尽撤锦州、右屯、大凌河诸城军民。时通判金启倧呈照：“锦、右、大凌三城，皆前锋要地，倘收兵退，既安之民庶复播迁，已复之封疆再沦没！”[9]高第不听，下令撤退，死亡塞路，哭声震野。翌年正月，努尔哈赤值明朝辽东经略易人之机，大举进攻宁远。明军虽获得“宁远大捷”，但后金军撤退时焚毁觉华岛囤粮城，并毁坏大凌河城。是为大凌河城第二次遭到弃毁。

再是，明军获得“宁远大捷”后，后金天命汗努尔哈赤死。明辽东巡抚袁崇焕藉给努尔哈赤吊丧之机，派员往后金“讲和”，以拖延时间，修缮大凌河城，加强前锋防守。天聪元年即天启七年（1627），明军虽获“宁锦大捷”，但后金撤军时，再毁大凌河城。是为大凌河城第三次遭到毁弃。

综上，自天命三年即万历四十六年（1618）后金军进攻抚顺，到大凌河之战以前，十四年之间，后金与明朝，发生八次大战——抚清、萨尔浒、开铁、沈辽、广宁、宁远、宁锦和京师之战。双方争战结局，后金六胜二负。后金对宁远、宁锦两战，虽遭失败，却不甘心。皇太极要寻找机会，进攻明朝。而明朝对丢失抚顺、清河、开原、铁岭、沈阳、辽阳、广宁、义州八城，也不甘心。崇祯初政，

力图复辽。明朝与后金在辽西争局，时势所趋，不可避免。明军在大凌河城已经三毁基址上筑城，受到后金的密切注视。明朝修复已毁的大凌河城，成为大凌河之战的直接导因。

先是，明辽东巡抚毕自肃在宁远兵变中遇害后，遂废辽东巡抚。明兵部尚书梁廷栋举荐丘禾嘉为辽东巡抚。而修复大凌河城的动议，同梁廷栋、丘禾嘉等有直接关系，但孙承宗对此不负主要责任。《明史·孙承宗传》记载：

> 禾嘉巡抚辽东，议复取广宁、义州、右屯三城。承宗言广宁道远，当先据右屯，筑城大凌河，以渐而进。兵部尚书梁廷栋主之，遂以七月兴工。

孙承宗的意思是：第一，广宁、义州，暂且不修。第二，右屯重要，距海较近，便于运粮，应先筑守。第三，为保右屯，还要修小凌河城与大凌河城，以成为其犄角。第四，大凌、小凌、右屯、锦州、松山、杏山、宁远诸城，关锦纵串连接，加强防御体系。第五，孙承宗已经预见到：明筑右屯，敌军必至；而筑大凌，敌更必争。然而，《明史·孙承宗传》所记含糊：既说督师孙承宗筑城大凌河，又说兵部尚书梁廷栋主之——营筑大凌河城，是孙承宗的主意，还是梁廷栋的主意，抑或是他人的主意？《崇祯长编》记载原任兵科给事中孙三杰的疏言，道出其中的关系：

> (周)延儒首据揆路，欲用其私人孙元化、丘禾嘉而无术，则属梁廷栋藉破格用人之说，以为先资。明知元化、禾嘉无功，而冒节钺，不足服人，则设为复广宁，图金、复、海、盖之议。既而一事无成，惧干严谴，于是密主大凌之筑，聊以塞责。奉举国之精锐，付之一掷。第罢枢辅孙承宗以结其案，而丘禾嘉忽焉山、永，忽焉京卿矣！延儒之脱卸作用，何其神也！[10]

上引奏言，清楚说明：首辅周延儒密主营筑大凌河城，而授意兵部尚书梁廷栋，并由巡抚丘禾嘉执行之。时孙承宗主张修筑右屯城。

天聪五年即崇祯四年（1631）正月，孙承宗以届七十高龄，抱病出山海关，巡视辽西防务，抵松山、锦州。时辽东巡抚为丘禾嘉。禾嘉，贵州人，万历四十一年（1613）举乡试，好谈兵。崇祯元年（1628）以其知兵，为兵部主事。后金军攻打北京，禾嘉监纪马世龙军。明复永平四城，禾嘉有功。兵部尚书梁廷栋举荐，破格任命丘禾嘉为辽东巡抚。[11]

时辽东巡抚丘禾嘉等主张收复广宁、义州、右屯三城。兵部尚书梁廷栋以此举重大，咨询孙承宗。孙督师覆言：广宁，海运、路运皆难；义州，地偏僻。因此，必须先占据右屯，集聚官兵，积蓄粮秣，方可逐进，逼近广宁。承宗又言："右屯城已隳，修筑而后可守。筑之，敌必至。必复大、小凌河，以接松、杏、锦州。"奏入，"廷栋力主之，于是有大凌河筑城之议。"[12]孙承宗依据时势，不主张复义州，更不主张复广宁；而力持修复右屯城。

由是，营筑大凌河城，由崇祯帝旨准，首辅周延儒授意，兵部尚书梁廷栋主之，巡抚丘禾嘉执行，督师孙承宗勉从，总兵祖大寿督责。在筑大凌河城工程中，巡抚丘禾嘉讦告总兵祖大寿，大寿也揭发禾嘉赃私。督师孙承宗不愿以武将去文臣，而密奏请改调丘禾嘉任他职。五月，命丘禾嘉任南京太仆寺卿，以孙[illegible]代之。禾嘉尚未离任，兵部传檄，催促甚急。其城池修筑，相关史料，引为参酌："刻下十月，计丈计尺，先筑土胎。土胎一就，先包城门二座，腰台二座。其所用砖石，察有兴水废堡，折（拆）运包砌"，不敷砖、石、灰另筹。"其挑河一事，工程浩大。且本镇营兵，尚须责以战守，不能独力办此。当蚤题班军，以正月到信，二月兴工，监管催督，另委能官，则亦可克期竣事矣。班军挑筑，行粮盐菜，自有往例，而筑城筑台，一切物料，费用不赀，朝廷当三空四尽之时，不敢数数控请"[13]云云。

祖大寿督工，以军兵四千，发班军四千，共同修筑大凌河城；并以四川石[illegible]土兵万人护卫。城工接近完成，兵部尚书梁廷栋罢去。廷议大凌河城荒远，筑城非策，乃令尽撤班军，赴蓟镇为守。丘禾嘉心惧，尽撤防兵，仅班军万人，给粮万石。孙承宗乃议以粮散军，委城而去，勿使资敌。但丘禾嘉违背督师意旨，与祖大寿及其弟大弼，纵马上城东望，并叹道：孙经略当年，以枢辅守边，有支持袁崇焕欲守宁远之勇气；今却欲委此大好城池丢弃，难道今无如袁崇焕之人乎？抑人官高而胆自薄耶？

祖大弼闻言，目视其兄；祖大寿见状，亦正视其弟。于是，祖大寿、祖大弼兄弟二人，愿率四千精兵，与万余戍兵，共守此城。

时大凌河城工，城基、墙垣、敌楼已粗完工，而城上雉堞，仅完成其半。城中明军有总兵祖大寿及副将何可纲等八员，参将、游击等约二十员，马兵七千、步兵七千，夫役、商人约万人，共有三万余人。[14]守将祖大寿所部皆精锐，配备大炮，防守甚坚。但该城动工兴建时间较短，雉堞仅修完一半，城中粮秣储备少。大凌城工甫竣，后金大军突至。

二

大凌河之战，有鲜明特点。

第一，守城与围城。后金军同明辽军作战，骑兵攻坚破城，都是速战速决，长期围城攻坚，自大凌河城始。

后金得到明军修筑大凌河城的探报，诸贝勒大臣奏道：“臣等愚见，此次出兵，彼若出战则已，倘彼遁入锦州，我兵不可引还。恐往返之间，徒疲马力，非计也。且彼以畏我，不战而退，我又何为还军？凡遇城池，务围困之，方为得计。倘蒙允行，则宜令多备糗粮，以充军实。至围城之事，秋不如夏之便也。”[15]上述意见，其要点是：第一，对凌城明军，加以围困；第二，明军出战，冲突驱杀；第三，明军弃城，加以截杀；第四，多备军粮，且要充足；第五，进兵时间，夏季为便。皇太极为慎重起见，再派原任总兵官纳穆泰等领兵前去探察。后金经三个月，凡十四次探察，得到明军修筑大凌河城的实情。皇太极决心进兵，攻打大凌河城。他说：“闻明总兵祖大寿与何可刚（纲）等副将十四员，率山海关外八城兵，并修城夫役，兴筑大凌河城。欲乘我兵未至时竣工，昼夜催督甚力，因统大军往征之。”[16]

天聪五年即崇祯四年（1631）七月二十七日，皇太极率军西发，运载红衣大炮，并征调蒙古兵，往攻大凌河城。八月初六日，后金军进抵大凌河城郊。明朝得报，兵部尚书熊明遇上言：“昨闻东兵六万，谋分三股来侵。”[17]翌日，皇太极鉴于宁远、锦州攻城失败的教训，不再驰骑攻坚，而是围城打援：“攻城恐士卒被伤，不若掘壕筑墙以围之。彼兵若出，我则与战；外援若至，我则迎击。”[18]

皇太极将后金军队，按照大凌河城四周，城上炮火不及之处，四方八隅，部署围城：城南面——正蓝旗兵围正南面，镶蓝旗兵围南面之西，蒙古吴讷格兵围南面之东，贝勒莽古尔泰、德格类等率护军在后策应。祖大寿突围回锦州，必全力从南面突破。因之，城南面是双方攻守的重点，两蓝旗承担最繁重、最艰难的围堵任务。城北面——正黄旗兵围北面之西，镶黄旗兵围北面之东，贝勒阿巴泰率护军在后策应。城东面——正白旗兵围东面之北，镶白旗兵围东面之南，贝勒多铎和多尔衮率护军在后策应。城西面——正红旗兵围西面之北，镶红旗兵围西面之南，蒙古鄂本兑兵围正西面，大贝勒代善、贝勒岳[illegible]率护军在后策应。蒙古诸贝勒，各率所部兵，围其隙处。总兵官额驸佟养性，率旧汉兵载红衣炮等火器，当锦州大道而营。诸将各守汛地，勿纵一人出城。

后金军四方八隅布兵后，环城浚壕筑墙，图持久以困之。皇太极命环城四面掘壕筑墙：第一道，掘壕深宽各丈许，壕外筑墙高丈许，墙上加以垛口；第二道，在墙内距五丈余地掘壕，广五尺、深七尺五寸，壕上铺秫秸，覆以土；第三道，在各旗营外周围挖掘深宽各五尺的拦马小壕。防守既固，城内、城外之人，遂不能通出入，大凌河城与外界完全隔绝。后金军在围困大凌河城的同时，又分兵设伏，往截援兵。各赴汛地，挖掘壕堑。经过三天战备，围城任务，初步完成。

第二，突围与夹击。皇太极使其兵诈为明兵之来援者，以诱祖大寿出战而攻之。大寿察觉，复退城内。初九日，大凌河城守军，少量骑兵出城，做拭探性出击。

初十日，祖大寿第一次突围。明军五百余骑出战，初做出城突围冲击。后金骑兵迎击，明军退回城内。

十二日，祖大寿第二次突围。他先派小股部队，从西面出城诱敌，后金正红旗图赖率军迎战；继派重兵从南面突围，同两蓝旗军遭遇。后金图赖率先冲入，额驸达尔哈率军继进，其他各军驰骑配合。两蓝旗兵进抵城壕，舍骑步战，明兵入壕。时壕岸与城上的明军，

骤然配合，矢炮齐发。两蓝旗兵，力不能抵，死伤惨重，仓皇败退。皇太极得知败报，非常气愤，对前往看视图赖伤势的阿巩岱等“唾其面”而羞辱之。莽古尔泰向皇太极流露怨言：“昨日之战，我属下将领被伤者多。”[19]皇太极不悦，兄弟二人，发生冲突。后皇太极以此为导火索，夺莽古尔泰和硕贝勒、降为多罗贝勒等。后莽古尔泰及其胞弟德格类俱“以暴疾卒”。[20]

三十日，祖大寿第三次突围。后金正红旗固山额真和硕图、镶红旗固山额真叶臣、正蓝旗固山额真色勒、镶蓝旗固山额真篇古、镶白旗固山额真图尔格及蒙古兵，一齐出营，进行夹攻。明军不敌，奔入城内。后金军追至城壕，城上炮火齐下，后金军队，退回大营。

九月十九日，祖大寿第四次突围。祖大寿率军从城西南隅突出。后金军在南面之西的镶蓝旗固山额真篇古、西面之南的镶红旗固山额真叶臣，及西面的蒙古固山额真鄂本兑和蒙古贝勒明安，共合四军，进行围堵。明军失利，退回城内。祖大寿闭城，自此以后，不再突围，等待援兵。

大凌河城被围，态势极为严重。《明纪》记载：“凌城出兵，悉败还。承宗闻之，驰赴锦州，禾嘉亦至。承宗遣总兵官吴襄、宋伟与禾嘉合兵往救。”明军要解围凌城，后金军则要打援，双方战斗，异常激烈。

第三，解围与打援。大凌河城被围，京师朝野震动。吏科给事中宋玫上言：“榆关外控，惟宁锦八城。而八城厚势，惟祖大寿一旅。毋论战守进退，夙将劲卒不可弃，实国家大势所关也。且大寿攖新造之版筑，即使其超轶绝伦，力能溃阵启行，势亦必借助外援。此又事理之必然者。倘文武将吏不及今并力速为声救，而漫视为可弃可存之著，俾大寿一旦力穷智索，则军声一跌，势难复振……倘敌人久缀大凌，阴谋间道，祸又不在己巳下矣。伏祈亟批御敕，谕辽抚、道、将，协图退敌，保全大凌城。”[21]朝廷采纳宋玫等奏言，决定派师往援。后金施行堵截与伏击的战术，既正面歼击来援之明军，又设伏截堵逃遁之明军。明朝先后四次出军，以解凌城被困之围。

八月十六日，明军第一次增援大凌河城。明派松山军二千人，出援大凌，被后金阿山、劳萨、图鲁什等军击败。二十四日，总兵官宋伟统兵马五千前赴宁远。[22]

二十六日，明军第二次增援大凌河城。时明督师孙承宗闻警紧急，驰赴锦州。先是二十三日，皇太极派贝勒阿济格及硕讬，率领精兵五百、蒙古兵五百，前往锦州、松山间，邀截明自锦州来的援军。在后金军扎设大营、布设埋伏三天后，明援大凌的军队自锦州而来。是日，“卯刻，明锦州副将二员，参将、游击十员，率兵六千，来攻阿济格营。时大雾，人觌面，不相识。及敌将至，忽有青气，自天冲入敌营，雾中开如门。于是，阿济格、硕讬列阵以待。顷之，雾霁。阿济格等进击之，大败敌兵。追杀至锦州城，生擒游击一员，获甲胄二百十九、马二百有六、旗纛十五。”[23]明少量援军，出师不利，遭到失败。

九月十六日，明军第三次增援大凌河城。皇太极率亲护军并贝勒多铎所部护军二百、营兵一千五百，佟养性所部旧汉兵五百，往击锦州方向来的明军援兵。皇太极见锦州城南尘土飞起，遂遣前哨图鲁什率兵前往侦察。皇太极命众军停止行进，率亲随护军与多铎等同往，缘山潜行。时锦州兵七千出城，逐图鲁什等至小凌河岸。明军前锋突近皇太极马前。皇太极擐甲弯弓，随行护军渡河直冲。明援军拚力冲杀，不敌溃遁；后金军奋力追击，至锦州城外。是战，多铎在交锋中坠马，其战马跑到明军阵中，幸有护从查符塔，将自己坐骑给多铎换乘。多铎危中逃出，险些被获。后金还军时，明兵复出击。明军步兵列车楯、大炮于城壕外，骑兵随其后，距里许而阵。皇太极督兵将向前冲杀，明军遭到攻击，奔回壕内。后金军斩明副将一员、官兵多人。[24]此战，明巡按王道直奏报：“大清数千骑，分列五股，直逼锦城。两镇张左右二翼迎击，接刀于教场，连战十余阵不胜，入城固守。”[25]

二十四日，明军第四次增援大凌河城。是日，明监军道张春、山海总兵宋伟、团练总兵吴襄，率诸将张弘谟等百余员、马步兵四万余，由锦州城出，往援大凌城。二十五日，明军渡小凌河，即掘壕堑，环列车楯，布设枪炮，阵列严整。二十六日，皇太极欲更番迎

击，因分军为二，亲先率其半挺进，逼近明军，亦列车楯，两军对峙。皇太极见明军森严壁垒，不宜轻战，决定暂退，“欲俟彼军起行前进，乘隙击之。”[26]于是，皇太极引兵远走大凌以诱之。其实，明朝庙堂、兵部早已预料：“贼夷久顿，不得野战，屡移营，以诱我。伪举火，以误凌，显属狡谋。”[27]明总兵宋伟、吴襄还是耐不得性子，急着前行解围。二十七日，明军见后金军不战而退，以为怯懦，四更起营，距城十五里，阵于长山口。宋伟、吴襄分立两营，排列枪炮，互为犄角。祖大寿在大凌河城遥望大军，恐为敌之诡计，不敢轻易突围。皇太极统率满洲、蒙古、旧汉兵一万五千挺进。后金分兵为三：皇太极亲率两翼骑兵，直冲明军大营；以另一部精锐兵，埋伏于明军归路；以车兵行动迟缓殿后。明军坚峙不动，严阵以待。皇太极乃率两翼劲骑，先冲向宋伟大营。两军接战后，“火器齐发，声震天地，铅子如雹，矢下如雨。”[28]后金军左翼避枪炮，未迎敌冲入，随右翼军后而进。宋伟营中，火器齐发，殊死力战；后金军纵骑冲锋，前锋兵多死伤。皇太极继麾左翼军趋吴襄军营，逼攻其大营；并以佟养性炮兵，自东向西，发大炮，放火箭，轰击其营。吴襄营毁，失利先走。宋伟与吴襄，不能配合，各自为战。吴襄军败走，宋伟营势孤。后金左右两翼军合兵，配合以汉兵火炮，猛攻宋伟营，冲入大营，明军遂败，奔溃逃遁。后金军“善伏善诱”[29]，预设伏兵，截吴襄军与宋伟军归路。明军四万，尽被歼灭，副将杨廷耀、张继绂、汪子静[30]等被斩。监军张春、副将张弘谟等三十三人被擒，部卒死者无算。明朝记载是：“总兵宋伟、吴襄及参将祖大乐……祖大弼，俱逃回。夷将桑昂那木、气七庆、归正黑云龙[31]、道臣张春、参将薛大湖俱被拘。”[32]明军本占数量优势，临战却“彼众我寡，彼聚我分”[33]。明援军以合为分，以分对合，溃败；后金军以分为合，以合对分，获胜。时被擒明军各官，见天聪汗皆跪拜，独监军张春直立不跪。皇太极大怒，援弓欲射之。代善谏曰：“我前此阵获之人，何尝不收养？此人既欲以死成名，奈何杀之以遂其志乎！”张春未被杀，不剃发，着明装，拘隐于沈阳城外长兴寺中。[34]后“不失臣节而死”[35]。

第四，守堡与用炮。后金同明军的大凌河之战，皇太极第一次使用红衣大炮。皇太极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，后金军必须拥有红衣大炮。天聪五年即崇祯四年（1631）正月，红衣大炮在沈阳制造成功，并任命佟养性为昂邦章京，组成旧汉兵（八旗汉军前身）。红衣大炮在大凌河之战中，《清史稿·佟养性传》记载：“八月，上伐明，围大凌河城。养性率所部载炮，越走锦州道为营。击城西台，台兵降。又击城南，坏睥睨。翼日，击城东台，台圮，台兵夜遁，尽歼之。”[36]又载：九月，“明监军道张春合诸路兵援大凌河，夜战，上督骑兵击破之。方追奔，明溃兵复阵。上命养性屯敌垒东，发炮毁敌垒。十月，攻于子章台，发炮击台上堞，台兵多死者。”[37]十月初九日，后金遣官八员，率兵五百人，及旧汉兵，运载红衣大炮六位、将军炮五十四位，往攻大凌河城附近的于子章台。此台，垣墙坚固，储粮甚丰。后金军向于子章台，连攻三日，守军顽抗。后金军以红衣大炮，击坏台垛，死者多人。台内守兵，孤立无援，无力御守。十二日，明守台参将王景，带领男女六百七十八人，开门出台，投降后金。于子章台被攻陷后，对其周围台堡波及影响：“是台既下，其余各台，闻风惴恐，近者归降，远者弃走，所遗粮糗充积，足供我士马一月之饷。”后金军取得一石三鸟——攻破敌台、获取粮食、实用大炮的效果。而红衣炮起着独特作用。史载：

> 至红衣大炮，我国创造后，携载攻城自此始。若非用红衣大炮击攻，则于子章台，必不易克。此台不克，则其余各台，不逃不降，必且固守。各台固守，则粮无由得。即欲运自沈阳，又路远不易致。今因攻克于子章台，而周围百余台闻之，或逃或降，得以资我粮糗，士马饱腾。以是久围大凌河，克成厥功者，皆因上创造红衣大将军炮故也。[38]

后金军用红衣大炮等火器，“其严困大凌，又散攻小堡”，[39]围城破堡，毁台打援，取得卓效。

第五，困危与招降。皇太极此战的两个目标是：招降祖大寿，摧毁大凌城。先是，八月

十一日，皇太极命系书于矢，射入大凌河城内，对城内的蒙古兵民夫商劝降，是为皇太极第一次招降书。招降书之后，是一场恶战。十四日，皇太极发出第二次招降书。是书从袁崇焕派李喇嘛吊丧说起，语气和缓，劝其投降。二次招降书之后，进行了两场激战。九月十八日，皇太极发出第三次招降书。三次招降书后，进行长山之战，明总兵宋伟、吴襄四万援军败溃。十月初七日，皇太极派阵获明军千总姜桂，携带分别给总兵祖大寿、副总兵何可纲和张存仁三封招降书。是为第四次招降书。祖不许姜入城，而在城关内见他，并说："尔不必再来，我宁死于此城，不降也!"遂遣姜桂还。初九日，皇太极向祖大寿发出第五次招降书。此书致祖大寿、何可纲、张存仁、窦承武四位将军，书称："姜桂还。言尔等恐我杀降，故招之不从。"皇太极表示："若杀尔等，于我何益？何如与众将军，共图大业。"并做出承诺：双方盟誓，"既盟之后，复食其言，独不畏天地乎！幸无迟疑，伫俟回音。"[40]

时大凌河城内缺粮绝薪：例一，"城中谷穗半堆，以汉斛约计之不过百石，原马七千，倒毙殆尽，尚余二百。其堪乘者，止七十匹。夫役死者过半，其存者不过以马肉为食耳。柴薪已绝，至劈马鞍为爨。"[41]例二，"城中粮绝，夫役、商贾悉饥死。见存者，人相食。"[42]例三，"军士饥甚，杀其修城夫役及商贾、平民为食，析骸而炊。又执军士之羸弱者，杀而食之。"[43]其四，"大凌自八月初六日受围，直至十一月初九日始溃，百日之厄，炊骨析骸，古所没有。"[44]例五，总兵祖大寿疏奏："被围将及三月，城中食尽，杀人相食。"[45]而祖大寿，解决办法：一是突围，但四次突围，均遭失败；二是待援，但四次增援，亦遭失败。祖大寿突围不成，援兵不至，弹尽粮绝，面临绝境。大凌城内危机，后金加紧劝降。十四日，皇太极再遣阵获参将姜新，复往招降祖大寿。是为皇太极第六次招降祖大寿。大寿遂遣游击韩栋与姜新，同往觐见皇太极。是晚，皇太极遣达海与姜新，复送韩栋入大凌城。二十三日，皇太极命系书于矢，射入大凌城内，是为第七次招降书。此书重申："或因误听尔官长诳言，以为降我亦必被杀。夫既降我，即我之臣民，何忍加以诛戮！况诱杀已降，我岂不畏天耶！"[46]祖大寿当夜三更密同张存仁到南门城楼内，只有二人，密议投降。祖大寿降志始决，由张存仁撰写回书。[47]二十五日，祖大寿令其义子泽润，以书二函，系之于矢，自城内射出。请皇太极令副将石廷柱前往，亲与面议。次日，后金副将石廷柱、巴克什达海等往城南台下，遣姜桂入城。既而姜桂偕城内游击韩栋至。韩栋言："我祖总兵欲石副将过壕，亲告以心腹之语。"经过一番周折，商定惟石廷柱一人过壕，与祖大寿相见。祖大寿提出："惟惜此身命，决意归顺于上。然身虽获生，妻子不能相见，生亦何益？尔等果不回军，进图大事，当先设良策，攻取锦州。倘得锦州，则吾妻子亦得相见。惟尔等图之。"于是后金派石廷柱等，祖大寿派祖可法等，就其降后"锦州或以力攻，或以计取"事宜，进行密商。二十七日，祖大寿遣使告知皇太极："我降志已决！"要求"誓诸天地。"他还提出："我亲率兵，诈作逃走之状何如?"二十八日，大凌城内各官，皆与祖大寿同谋归降，独副将何可纲不从。祖大寿做了一件对不起生死与共同僚的歉疚之事：

> 大凌河城内各官，皆与祖大寿同谋归降，独副将何可刚（纲）不从。大寿执之，令二人掖出城外，于我诸将前杀之。可刚（纲）颜色不变，不出一言，含笑而死。城内饥人，争取其肉。[48]

对何可纲之死，他们编造材料上报朝廷："初未溃前一日，凌城食尽。副总兵何可纲语大寿曰：'子可出慰阁部，我当死此！'自为文以祭，遂死之。"[49]后明廷略明迹象：直隶巡按王道直疏奏："凌河之困，独副总兵何可纲，大骂不屈，死无完肤。其正气万夫不惴，而忠心千古为昭。"[50]

祖大寿杀死副将何可纲后，遂遣副将四员、游击二员到后金军大营。皇太极同诸贝勒对天盟誓。誓曰：明总兵官祖大寿，副将刘天禄、张存仁、祖泽润、祖泽洪、祖可法、曹恭诚、韩大勋、孙定辽、裴国珍、陈邦选、李云、邓长春、刘毓英、窦承武等，"今率大凌河城内官员兵民归降。凡此归降将士，如诳诱诛戮，及得其户口之后，复离析其妻子，分散

其财物、牲畜，天地降谴，夺吾纪算。若归降将士，怀欺挟诈，或逃或叛，有异心者，天地亦降之谴，夺其纪算。”祖大寿等誓曰：“祖大寿等，率众筑城，遇满洲国兵，围困三月，军饷已尽，率众出降，倾心归汗。”[51]盟誓天地后，皇太极请祖大寿急言：当用何策，以取锦州？祖大寿向皇太极进图锦州之计。此事，史载：“大寿言妻子在锦州，请归设计，诱降守者，遂纵归。”[52]天聪汗皇太极许之。祖大寿依计献城投降，留其义子祖可法为人质。

二十九日夜，皇太极命贝勒阿巴泰、德格类、多尔衮、岳讬，率梅勒额真八员、官四十员、兵四千人，俱作汉装，偕祖大寿及所属兵三百五十人，作溃奔状，袭取锦州。漏下二鼓，大凌河城内，炮声不绝。祖大寿等从城南门出，率兵起行。阿巴泰等亦率军前往。时天降大雾，觌面不相识，军皆失伍，遂各收兵。及明，而还。是夜，锦州明兵，闻到炮声，以为大凌河人得脱，分路应援，被后金军击败。祖大寿等出城后，跑到白云山，时天有大雾。翌日（初一日）二更，祖太寿带领从子祖泽远及从者二十六人，进入锦州城。[53]

祖大寿自凌城“突围”还锦州。后金破大凌河城。时城中存者止万一千六百八十二人，马三十二匹。祖大寿去而未归，亦未内应。皇太极向诸贝勒解释曰：“朕思与其留大寿于我国，不如纵入锦州。令其献城，为我效力。即彼叛而不来，亦非我等意料不及而误遣也。彼一身耳，叛亦听之。”[54]皇太极以此自解。

三

大凌河之战，明金得失，及其影响，略作申论。

后金天聪汗皇太极于十一月初九日，下令将大凌河城摧毁，降人剃发，并派军悉毁大凌河至广宁一路墩台。后金军携大小火炮三千五百位，并鸟枪火药铅子等战利品，班师。皇太极从七月二十七日离开沈阳，到十一月二十四日回到盛京，其间一百一十五天。大凌河城中军民，从八月初六日被围，到十月二十九日祖大寿出降，其间八十三天。

明朝在大凌河之战中，官兵守城，失陷；派兵解围，溃败；城守总兵，投降。其中原因，值得探讨。

第一，明朝庙堂，小胜而骄。明朝收复永平等四城后，其在辽西战场的兵略，是凭城用炮固守，还是贸然筑城进取？这里有两个重要因素，一是关内形势，二是关外形势。于关内，西北民变蜂起，明朝将关内军队主力投到西北地区。以《国榷》为例，崇祯四年(1631)四月至十月的大凌河战事期间，纪事总数为一百四十条，其中有关西北民变事七十三条，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二；辽事七条，占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五。这说明庙堂的专注点在于镇压西北民变，而没有实力在辽西拓展。于关外，明督师孙承宗收复永平等四城，将后金军赶出山海关后，不顾年迈，亲赴辽西，整顿关锦防线，重振辽军朝气。但一些廷臣，头脑发胀，热衷进取，忽略固守。山东登莱巡抚孙元化，建议撤海岛之兵，移驻山海关外，并规复广宁、金州、海州、盖州。辽东巡抚丘禾嘉则“议复取广宁、义州、右屯三城。”[55]丘巡抚的后台是枢部梁廷栋和首辅周延儒，其城大凌、取义州、图广宁的设想，得到他们或隐或显的支持。于是，明朝以锦州为基地，修大凌城，派兵驻守，逐节推进。其时，摆在督师孙承宗、巡抚丘禾嘉面前有两个问题：大凌河城该不该修？大凌河城该不该守？

大凌河城该不该修？首辅、兵部、督师、巡抚、总兵的看法并不一致。关于大凌河城的兴筑，意见纷纭，前文已述。大凌河城失守后，追查责任：“曩时凌城之筑，枢辅鲁主其议。今即不必为既往之追咎，顾安所辞于就事论事之责任哉！”[56]一些大臣将主张修筑大凌河城的责任推到孙承宗身上。大凌河城该不该守？如该守，应派军驻守；不该守，应敌来即撤。明军大凌河之败的悲剧在于：虽获取小胜，却骄傲轻敌。明军对大凌河城：固守，而未备粮储，不像固守；撤守，而没有离退，不像撤守。本来，大凌河城的官兵、班军、夫役、商民，主要任务是筑城。朝廷没有边筑边守，更没有长期固守的方略。明军疏于哨探，对后金军的突袭，是守，还是撤，决策犹疑，判断错误。明朝既没有部署固守，也没有及时撤退。其结果只能是：凌城被围，城陷兵败。

第二，指挥不力，临战易抚。天启、崇祯年间，皇帝、首辅、兵部、经略、巡抚、总兵，指挥辽东军事，运作机制不灵。其中，以枢臣、经略、巡抚三者，分别掌握辽事大计，其庙堂决策与临阵指挥，未能相辅相依，也未能协和一致。而枢部、经略、巡抚，三臣争讧，互相侵权，或则筑守分歧，或则战守不一，或则彼此掣肘，或则不受节制，造成上下不协、运作失灵的局面。崇祯帝既刚愎自用，又缺乏辽事方略。且对辽西重臣疑虑，滥杀无辜忠臣良将。袁崇焕死后，孙承宗老病，巡抚不受督师节制，属下抗命，相互猜忌。以孙承宗为例，他于天聪五年即崇祯四年（1631）四月初三日“以病衰求退”，二十日又以“病剧不能督师复请罢职”，俱“优旨不允”。[57]孙承宗以“骑坐不便”而“暂住宁远”指挥。孙督师以年迈抱病之躯，协调战守，但遭疏劾：“枢辅孙承宗，荷累朝荣宠，受皇上恢复全辽之委。顷者大凌之筑，谁开衅端？长山之溃，孰为谋主？顾以数万甲兵，委之飘风，而竟翩然衣锦也。误封疆而背君父，罪孰甚焉！”[58]孙承宗、熊廷弼、袁崇焕之任辽事，皆为盖世之雄才，堪称能胜任其职者。他们三人所用之将，能委身许国，而效死不屈。只以阉竖宵小当朝，阴相排挤，暗设机关，又使文墨者流，从中横议。熊廷弼尝言：“朝堂议论，全不知兵。”袁崇焕也说：“以臣之力，制全辽有余，调众口不足。一出国门，便成万里。忌能妒功，夫岂无人？即不以权力掣臣肘，亦能以意见乱臣谋。”[59]他们三人，结局悲惨：孙承宗遭到劾斥，熊廷弼传首九边，袁崇焕罹受磔刑。明朝君主，自坏长城。至于辽西大将，赵率教被拒之遵化城外，野战而死；祖大寿力屈被招降；何可纲惨遭主帅杀害。大凌河之战，明军失去辽东最后一员勇将，丧失辽西最后一支劲旅。

大凌河城的修筑与固守，皇帝、首辅、兵部、督师、巡抚、总兵，对大凌河城之战守，缺乏整体明确战略。尤在危急时刻，调动辽东巡抚。先是，丘禾嘉与祖大寿不协，巡抚讦告总兵，总兵揭赃巡抚。督师孙承宗无奈，密奏于朝，禾嘉他调。《明纪》记载：“先是，调禾嘉南京太仆寺卿，以孙穀代，未至而罢。改命谢琏，琏惧，久不至。兵事急，召琏驻关外。禾嘉留治事。及是移驻松山，图再举。”[60]崇祯帝谓：“急援凌城与饬备蓟防，已有严旨。丘禾嘉倚任方切，当鼓励图功。谢琏到日，令暂驻关外料理，俟事平议代。”[61]大凌激战正酣，又改任刘宇烈。[62]辽东巡抚，数月之间，先后四人，大员之任免，竟视同儿戏。辽西烽火前线，巡抚忽而禾嘉，忽而孙穀，忽而谢琏，忽而宇烈，已经任职者拨弄是非，新命调任者怕死抗旨，再任命者尚未到任。封疆大吏，尚且如此，守城官兵，何能取胜？

第三，互不配合，坐失良机。在大凌河之战中，明朝枢督不协、督抚牴牾、总兵拒不互援、将领自相残杀——是明军失败的重要原因。孙承宗为解大凌之围、带抱病之躯，驰赴宁远城，遣总兵吴襄、宋伟往救。但巡抚不听督师意见，禾嘉屡易师期，错过出援良机。言者追论丧师辱国之责，孙承宗“极言禾嘉军谋牴牾之失”。这表明督师与巡抚之间的嫌隙。而总兵与总兵之间的矛盾，则表现为互相观望，拒不支援。长山之战，明援军四万人，凌城军一万五千人；而后金军明朝说三万人，《清太宗实录》说近两万人，《满文老档》则说实际上为一万五千人。后金军先攻明援军宋伟营，未见奏报吴襄军援救；后金军攻宋伟营受挫而转攻吴襄营，也未见奏报宋伟军援救。明军四万人的优势，分为二营，化众为寡，互不援应，以分对聚，结果被后金军各个击破。同时，大凌河城内，守军、班军等三万人，祖大寿未能乘机突围，里应外合，夹击逸出，共同破敌；却丧失良机，坐以自毙。更有甚者，总兵祖大寿亲自杀死副将何可纲。明朝锦州、大凌及附近百座台堡，总计七八万人，有辽西关锦防线做后盾，有连串八城做奥援，却援军溃败，而大凌失陷。

明援军长山之败，《明史·孙承宗传》论道：“禾嘉屡易师期，伟与襄又不相能，遂大败于长山。”此战，巡抚丘禾嘉没有起到指挥协调作用，“救凌之师，以轻入溃败。”[63]两位总兵，不相援助，责任更大。直隶巡按王道直以长山之败，疏参总兵吴襄、宋伟：“临阵退缩，战溃偷生，为军纪所不宥。”陕西道御史周堪赓劾言：“总兵宋伟、吴襄，不能奋身遏

敌，徒惜身命，致长山之役，丧师辱国。”[64]明两路援军，意志不一，暮气沉沉，各自为战，轻敌冒进，腹背受击，自速取败。事后有人总结辽东指挥体系的矛盾。蓟辽总督曹文衡上言：“长山一战败绩，未始不由抚臣不总督师之权故也。臣熟审机宜，谓于关外抚臣，必加督师之衔，巡抚辽东。”[65]就是说，督师与巡抚的矛盾，除个人品质与素养因素外，还要从体制上加以解决，督师与巡抚，一人而兼之。

明朝经大凌河之战，损失惨重，关外劲旅，丧失殆尽。王师疲于奔命，虽能固守关门，但内地之民变，从此四方蜂起。关外既无宁土，关内也无宁日。

天聪汗皇太极在指挥大凌河之战中，将围城、和谈、攻坚、打援相结合，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围城打援、亦战亦款的成功战例。皇太极运用兵法“攻其无备、出其不意”[66]之典则，既攻敌之“不备”，又出敌之“不意”——不意迅速反攻之、不意长久围困之、不意用炮轰击之，不意以款招降之。在大凌河之战中，八旗军攻大凌城，占领；围城打援，胜利；纳款祖大寿，招降。其中得失，值得探讨。

第一，不善把握作战时机。皇太极指挥此战，虽获重大军事与政治之成果；却拖延时间过长，付出代价过大。后者原因之一，是作战时机选择不当。皇太极自继承汗位并亲自主持重要战役以来，一个重大缺失，是不善于把握作战时机。他即位后亲自指挥的宁锦之战，之所以失败，其原因之一，是时机不利。因为略早一些，锦州城未筑完；略晚一些，则袁崇焕去职。他却选在这两个于己不利的时机之间。他亲自指挥的北京之战，之所以失利，其原因之一，也是时机不利。因为略早一些，袁崇焕尚未任命、阉党尚未铲除、东林内阁亦未形成；略晚一些，阉党重新控制阁部，也会是另一番局面。他恰在两次阉党失势、东林内阁执政这个于己不利的时间。他亲自指挥的大凌河之战，在作战时机选择上，也是慢了半拍。皇太极发动大凌河之战，主要是不让明军筑城，而逼其退回锦州。要是天聪汗进攻大凌河城，时间提早一个月，即在明军筑城未完之时，那么驱赶筑守大凌城的明朝军夫会容易得多，不至于费时四个月，也不至于伤亡那么多的官兵。其实，皇太极早在天聪五年即崇祯四年（1631）四月，就先后两次派员往明边境捉生。很快得到探报：“明人修筑大凌河城，基址已完，灰池亦备。”[67]五月初六日，诸贝勒大臣举行会议奏报：“明人若果修城，我兵即当速往，不知皇上庙算如何？”大凌河城距沈阳并不远，三万军夫筑城驰探也并不难。皇太极却三番五次地派人前去探察。直至七月二十七日，皇太极才率军出征。中间整整拖了三个月。以上三例说明：皇太极在指挥重大战役决策时，选择战机，犹豫迟疑，缺乏睿断。这给后金及其军队，造成重大而惨痛的损失。

第二，后金改变攻明兵略。在大凌河之战中，就天聪汗与众贝勒来说，招降总兵祖大寿，摧毁明朝大凌城，得到良将精兵，缴获军械火器，收获可谓良多矣。然而，后金军的士卒没有掠到财富，也没有抢到金银。后贝勒阿济格奏言：

> 先我兵围大凌河，四阅月，尽获其良将精兵。在皇上与诸贝勒大臣，固有得人之庆；但部下士卒，及新附蒙古等，一无所获，皆以为徒劳。[68]

正红旗固山额真和硕图也奏言：

> 向荷天佑，得大凌河。皇上与贝勒大臣，无不忻然；以下士卒，则皆不乐。[69]

后金军官兵，自备马匹、器械，自带干粮、衣物，抛下妻妾儿女，冒着生命危险，却没有从大凌河之捷中得到实惠，一无所获，牢骚抱怨。大凌河之战，对皇太极改变辽西攻城战，而为入关掠夺战，产生重要影响，起着重大作用。从此，后金调整对明兵略，将同明关外八城逐城争夺战，转变为入关掠夺战，四派大军，绕道蒙古，深入内地，掳掠财富，残毁中原。

第三，后金组成八旗汉军。后金军宁远与宁锦两败，究其原因，从武器说，就是没有红衣大炮。皇太极从两次血的失败教训后，终于觉醒：要制造红衣大炮，应组建炮兵部队。于是，后金在天聪五年即崇祯四年（1631）正月，创制红衣大将军炮成功。[70]从此，后金开始自己制造红衣大炮。八月，皇太极在大凌河之战中，第一次使用红衣大炮获得成功，并招降“祖家军”官兵。后金总结红衣大炮的作用

是:“久围大凌河，克成厥功者，皆因上创造红衣大将军炮故也。自此凡遇行军，必携红衣大将军炮。”红衣大炮，用于实战。在大凌河之战中，八旗军用红衣大炮围城、打援、突袭、破堡，大炮所向，尽显神威。后满洲通过仿造、缴获等手段，获取了大量红衣大炮，使八旗军如虎添翼。有新的武器，必有新的军制。后金变革军制，建立乌真超哈，组建八旗汉军，将昔日防范之敌人，变成后金军队之鼎足。用红衣大炮装备八旗军，既引起攻城战术的变化，也引起八旗军制的变革。乌真超哈向八旗汉军的演变，体现出后金炮兵由小到大、逐步趋向正规化的过程。实际上它还是炮兵、骑兵、步兵及辎重运输兵之混合编制。

大凌河之战，明朝大凌城失陷，祖大寿投降，“祖家军”瓦解，关外精锐，丧失殆尽；后金更加强盛，后建八旗汉军，四入塞内，掳掠财富，残毁中原。大凌河之战，后金获得战略性的胜利，明朝遭到战略性的失败——加速了明亡清兴的历史进程。

①明人称大凌河城（今辽宁锦州大凌屯），或大凌城、凌城。此役之战场，包括城外广大地域。此战全称为大凌河城之战，今约定俗成而称为大凌河之战。

②《明熹宗实录》卷七九，第 19 页，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。

③《清太宗实录》卷三，第 16 页，中华书局影印本。

④《袁崇焕研究论集》第 181 页，文史哲出版社。

⑤顾祖禹: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卷三七，第 36 页，上海书店出版社。

⑥李辅:《全辽志·图考》卷一，第 13 页，“辽海丛书”本。

⑦王在晋在《三朝辽事实录》中，将天命三年即万历四十六年“奴尔哈赤计袭抚顺”，作为“辽事”之起端。

⑧《明史·张凤翼传》卷二五七，第 6631 页，中华书局。

⑨《明史·袁崇焕传》卷二五九，第 6708 页。

⑩《崇祯长编》卷六二，第 6 页，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。

⑪明以举人而官至巡抚者，隆庆朝只海瑞，万历朝只张守中、艾穆，天启朝没有，崇祯朝则丘禾嘉等。

⑫《明史·丘禾嘉传》卷二六一，第 6770 页。

⑬李光涛:《明清档案论文集》第 494 页，台湾联经出版实业公司。

⑭㊹《兵部呈为王道直题报大凌河城之役明军损失情形本》《历史档案》1981 年第 1 期。

⑮⑯⑱⑲㉓㉔㉖㉛㊶㊼《清太宗实录》卷九，第 2 页；第 12 页；第 14 页；第 19 页；第 23 页；第 25 页；第 28 页；第 29 页；第 27 页；第 2 页。

⑰《崇祯长编》卷四九，第 14 页。

⑳《清史列传·冷僧机》卷四，第 33 页，上海中华书局。

㉑㉕56 61《崇祯长编》卷五十，第 6 页；第 11 页；第 15 页；第 7 页。

㉒《明清史料》乙编，第 1 本，第 70 页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本。

㉗㉙㉝㊴《明清史料》乙编，第 1 本，第 81 页；第 79 页；第 67 页；第 66 页。

㉘《满文老档·太宗》V，第 566 页，东洋文库。

㉚《清太宗实录》卷九、页 29“张继绂”误作“张吉甫”，“汪子静”误作“王之敬”，“海参代”误作“海三代”。

㉜《清太宗实录》卷九记载：时“大雨滂沱，前阵获总兵黑云龙乘隙单骑而逃。”

㉞《李朝仁祖大王实录》卷二五，第 51 页，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。

㉟《明史·张春传》卷二九一，第 7464 页。

㊱《清史稿校注》卷二三八，第 8064 页，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99 年。其“翼”字，《清史稿·佟养性传》(中华书局本) 作“翌”。

㊲《清史稿·佟养性传》卷二三一，第 9324 页，中华书局。

㊳㊵㊷㊸㊻㊽51 54《清太宗实录》，卷十，第 3—4 页；第 3 页；第 3 页；第 4 页；第 6 页；第 10 页，第 11 页；第 13 页。

㊺53《崇祯长编》卷五二，第 3 页。

㊼《清太宗实录》卷六十，第 4 页。

㊾62 63《崇祯长编》卷五一，第 33 页；第 10 页；第 15 页。

㊿58 64 65《崇祯长编》卷五三，第 16 页；第 6 页；第 7 页；第 10 页。

52《通鉴辑览》卷一一四，第 8 页。

55《明史·孙承宗传》卷二五〇，第 6476 页。

57《崇祯长编》卷四六，第 26 页。

59《明史·袁崇焕传》卷二五九，第 6713 页。

60陈鹤:《明纪》卷五三，《庄烈纪二》。

66《孙子·计篇》卷上，第 18 页，中华书局。

68 69《清太宗实录》卷十四，第 13 页；第 18 页。

70《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》上册，第 9 页，光明日报出版社。